



安徽师范大学文学院学术文库（第四辑）



# 儒佛道哲学的 诗性智慧

RU FO DAO ZHUXUE DE SHIXINGZHIHUI

华雨檀 著

安徽师范大学出版社



安徽师范大学文学院学术文库（第四辑）

学大成安五国

# 儒佛道哲学的 诗性智慧

RU FO DAO ZHEXUE DE SHIXINGZHIHUI

华雨檀 著



安徽师范大学出版社

· 芜湖 ·

责任编辑:李克非

装帧设计:丁奕奕 欧阳显根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儒佛道哲学的诗性智慧/华雨檀著.—芜湖:安徽师范大学出版社,2019.1

(安徽师范大学文学院学术文库·第四辑)

ISBN 978-7-5676-3479-4

I. ①儒… II. ①华… III. ①儒家—中国—文集 ②佛教—中国—文集 ③道教—中国—文集 IV. ①B222.05-53 ②B948-53 ③B958-53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8)第064835号

本书由安徽高校省级学科建设重大项目资助出版

儒佛道哲学的诗性智慧

华雨檀 著

---

出版发行:安徽师范大学出版社

芜湖市九华南路189号安徽师范大学花津校区 邮政编码:241002

网 址: <http://www.ahnupress.com>

发 行 部: 0553-3883578 5910327 5910310(传真) E-mail:asdcbfsxb@126.com

印 刷:虎彩印艺股份有限公司

版 次:2019年1月第1版

印 次:2019年1月第1次印刷

开 本:700 mm×1000 mm 1/16

印 张:21.75

字 数:330千字

书 号:ISBN 978-7-5676-3479-4

定 价:60.00元



---

凡安徽师范大学出版社版图书有缺漏页、残破等质量问题,本社负责调换。

## 总 序

安徽师范大学文学院的前身是1928年建立的省立安徽大学中国文学系，是安徽省高校办学历史最悠久的四个院系之一。1945年9月更名为国立安徽大学中文系，1949年12月更名为安徽大学中文系，1954年2月更名为安徽师范学院中文系，1958年更名为合肥师范学院中文系，1972年12月更名为安徽师范大学中文系，1994年10月更名为安徽师范大学文学院。这里人才荟萃，刘文典、陈望道、郁达夫、朱湘、苏雪林、周予同、潘重规、宗志黄、张煦侯、卫仲璠、宛敏灏、张涤华、祖保泉、余恕诚等著名学者都曾在此工作过，他们高尚的师德、杰出的学术成就凝成了我院的优良传统，培养出了一大批出类拔萃的各类人才。

文学院现设有汉语言文学、秘书学、汉语国际教育、戏剧影视文学等4个本科专业，语言研究所、古籍整理研究所等5个研究所（中心）。拥有中国语言文学博士后科研流动站，中国语言文学一级学科硕士点、博士学位点；设有中国古代文学等10个硕士学位二级学科授权点和学科教学（语文）、汉语国际教育两个专业学位点；有1个安徽省一流学科（中国语言文学，2017），安徽省A类重点学科（中国语言文学，2008），3个安徽省B类重点学科（中国古代文学、汉语言文字学、中国现当代文学）；有1个国家级特色专业建设点（汉语言文学专业），1个国家级教学团队（中国古代文学），两门国家级精品课程（文学理论、大学语文）；主办1种省级刊物（《学语文》）。

文学院师资科研力量雄厚，现有在岗专任教师95人，其中教授26人，副教授32人，博士52人。2010年以来，本学科共主持省部级以上科研项目131项，其中国家社科基金项目41项（含重大招标项目2项和重点项目3项），获得省部级以上奖励24项。教师中，有国家首届教学名师1人，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12人，皖江学者3人，二级教授8人，5人入选省级学术和技术带头人，6人入选省级学术和技术带头人后备人选。

走过九十年的风雨征程，目前中文学科方向齐全，拥有很多相对稳定、特色鲜明的研究领域。唐诗研究、古代文论研究、儿童语言习得研究、古典文献研究、宋辽金文学研究、词学研究、当代文学现象研究、古典诗歌接受史研究、梵汉对音研究、句法语义接口研究等，在全国居于领先地位或在学术界有较大影响。特别是李商隐研究的系列成果已成为传世经典，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委员、北京大学教授袁行霈先生说，本学科的李商隐研究，直接推动了《中国文学史》的改写。

经过几代人的薪火相传，中文学科养成了严谨扎实的学术传统，培育了开拓创新的学术精神，打造了精诚合作的学术团队，形成了理论研究与服务社会相结合、扎根传统与关注当下相结合、立足本位与学科交融相结合、历代书面文献与当代口传文献并重的学科特色。

21世纪以来，随着老一辈学者相继退休，中文学科逐渐进入了新老交替的时期，如何继承、弘扬老一辈学者的学术传统，如何开启中文学科的新篇章，成了摆在我面前的迫切任务。基于这一初衷，我们特编选了这套丛书，名之为“安徽师范大学文学院学术文库”，计划做成开放式丛书，一直出版下去。我们认为，对过去的学术成果进行阶段性归纳汇集，很有必要，也很有意义，可以向学界整体推介我院的学术研究，展现学术影响力。

现在奉献的是第四辑，文集作者既有资深的老教师，也有年富力强的年轻学者，学科领域涵盖文学、语言学等领域，大致可以反映文学院学术研究风貌的历史传承与时代新变。

## 总序

---

我们坚信，承载着九十年的历史积淀，文学院必将向学界奉献更多的学术精品，文学院的各项事业必将走向更悠远的辉煌！

储泰松

二〇一八年十月

# 目 录

## 上编 诗性的哲学

### 从诗人之情到哲人之思

|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     |
|------------------------|-----|
| ——论《诗经》二雅与竹简《老子》的契合与演进 | 3   |
| 孔子说“愚”                 | 12  |
| 庄子解脱论新探                |     |
| ——以《庄子》中“心”的义涵为视角      | 20  |
| 论魏晋南北朝大乘佛教对妇女精神风貌的影响   | 28  |
| 刘勰论儒佛道三教关系             |     |
| ——以《灭惑论》为中心            | 40  |
| 柳宗元:唐代三教融合思潮中的儒家代表     | 55  |
| 论柳宗元的孔子观及其时代意义         | 69  |
| 论柳宗元的孟子观               | 84  |
| 论孤山智圆的韩愈观              | 98  |
| 释氏眼中的柳宗元               | 116 |
| 论湛然居士的融和佛教观            | 122 |
| 天主教与佛教儒学化之比较与反思        |     |
| ——以“礼仪之争”与“沙门议敬”为中心    | 136 |
| 敬畏生命: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关键词      | 146 |

## 下编 哲学的诗性

|                 |     |
|-----------------|-----|
| 论《庄子》“环中”的美学意蕴  | 161 |
| 《世说新语》审美范畴摭论    | 172 |
| “水中月”的佛学渊源与艺术生成 | 182 |
| 帝网天珠：华严诗性精神谫论   | 200 |
| 禅宗自然观的美学意蕴      | 213 |
| 诗情与道性           | 223 |
| 论偈与诗的界限         | 235 |
| “东山法门”与盛唐诗坛     | 247 |
| 诗僧皎然“情”论        | 260 |
| 论柳宗元的《东海若》      | 274 |
| 柳宗元《大鉴碑》中的“负问题” | 286 |
| 契嵩非韩的文学意义       | 297 |
| 钟鼎与山林：子聪诗论的双重性  | 315 |
| 论李贽的人文生态观       | 328 |
| 后记              | 336 |

上编 诗性的哲学



# 从诗人之情到哲人之思

——论《诗经》二雅与竹简《老子》的契合与演进

近年来，随着一些战国楚墓竹简的发现，先秦儒道之间的关系又成了学界讨论的热点。郭店楚简《老子》<sup>①</sup>没有对儒家的批评，相反却有一些提倡仁义礼智的文字；上博简《民之父母》中，孔子提倡“无声之乐，无体之礼，无服之丧”的“三无说”，这显然又近似道家的思想<sup>②</sup>。种种证据表明，春秋时期儒道两家思想并没有形成对立，甚至可以说，儒道那时还没有形成自觉的学派意识。其实，《庄子·天下》早就认识到了这一问题，它把“数度”和《诗》《书》《礼》《乐》《易》《春秋》称为“古之道术”，把它们置于“道术将为天下裂”之前，也就是说，“六经”并非儒家的专利，而是当时贵族共同学习的文化遗产。

《诗经》分风雅颂三部分，就作者的社会、政治地位及写作旨趣而言，雅与诸子更为接近，因而对诸子的影响也更大。如《墨子》引《诗》十一处，其中八处出自二雅；《孟子》引《诗》约三十四处，其中约三十处出自二雅<sup>③</sup>。竹简《老子》是我们今天所能见到的最早的《老子》传本，它可能形成于春秋时期，比今本《老子》更接近祖本，更能反映道家

<sup>①</sup>本文所引竹简《老子》，以荆门市博物馆《郭店楚墓竹简》（文物出版社1998年版）为主，并参照廖名春《郭店楚简老子校释》（清华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）。

<sup>②</sup>庞朴：《话说“五至三无”》，《文史哲》2004年第1期。

<sup>③</sup>徐复观：《徐复观论经学史二种》，上海书店出版社2002年版，第41、31页。

的源头情况<sup>①</sup>。尽管我们不能肯定《老子》的作者读过《诗经》，在《老子》中也找不到引《诗》的明显证据，但在竹简《老子》中，的确有不少思想是与《诗经》二雅相一致的。

—

大雅 31 篇，大部分作于西周初期，小部分作于西周末期；小雅 74 篇，大都是西周晚期的作品，还有少数可能作于东周。大雅的作者主要是上层贵族；小雅的作者，既有上层贵族，也有下层贵族和地位低微者。关于《老子》的作者，历来聚讼纷纭。<sup>②</sup>郭店竹简《老子》的出土，为此问题的解决提供了更多的证据。有人提出竹简《老子》出自老聃或其亲传弟子之手，今本是太史儋在老聃原本基础上加工、改造、扩充而成。<sup>③</sup>此观点使关于老子的一些悬案可以得到大体圆满的解决，得到不少学者的赞同。虽然我们不能断定竹简《老子》就是祖本，但它应该大致能反映老聃的思想。

周代贵族分为六个等级：“君一位、卿一位、大夫一位、上士一位、中士一位、下士一位，凡六等。”（《孟子·万章下》）“士”是贵族阶级的最低一层，地位略高于“庶人”，老聃作为“周守藏室之史”（《史记·

<sup>①</sup> 郭沂：《楚简〈老子〉与老子公案——兼及先秦哲学若干问题》，《中国哲学》第二十辑，辽宁教育出版社 1999 年版。

<sup>②</sup> 司马迁根据当时的文献和传说，本着“信以传信，疑以传疑”的原则，提出三个老子：一是周守藏史老聃，二是老莱子，三是战国中期的秦太史儋。老莱子另有他著，学界多把他排除，而在老聃与太史儋之间难以定论。北魏崔浩首先怀疑通行本《老子》不是老聃所作，南宋叶适认为老聃与通行本《老子》的作者应是两个人，清代汪中认为《老子》上下篇的作者应是太史儋。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，关于老子“其人其书”曾有一次集中的讨论，大致有三派意见：一是春秋末年说，二是战国说，三是秦汉之间或汉文帝之时说。一直到二十世纪八十年代，围绕“老子其人其书”问题还是争论不休，无有定论。

<sup>③</sup> 郭沂：《楚简〈老子〉与老子公案——兼及先秦哲学若干问题》，《中国哲学》第二十辑，辽宁教育出版社 1999 年版。

老庄申韩列传》），应属于“士”这一阶层，与二雅的大部分作者地位相当。《老子》中，也有多处提到“为士”之道。竹简《老子》的传者——郭店一号楚墓的墓主，身份为楚国某位太子的老师，也属“士”阶层<sup>①</sup>。总之，不论是竹简《老子》的作者，还是传习者，地位上都与二雅的大部分作者接近。

二雅与竹简《老子》有相近的写作旨趣。《毛诗序》曰：“雅者，正也，言王政之所由废兴也。政有小大，故有小雅焉，有大雅焉。”面对礼崩乐坏，政教缺失，人伦废绝，刑政苛酷的现实，二雅的作者们以诗歌的形式来针砭时弊，探究王朝衰落的原因，为周王献计献策。如《小雅·节南山》：“家父作诵，以究王讻。”点明写作的主旨在于探究周王朝凶乱的原因。又如《大雅·抑》：“于乎小子，未知臧否。匪予携之，言示之事。匪面命之，言提其耳。”这是一位老臣对周王耳提面命的谆谆教诲。

《汉书·艺文志》说：“道家者流，盖出于史官，历记成败存亡祸福古今之道，然后知稟要执本。”此语对竹简《老子》来说尤其合适。竹简《老子》大约有相当于今本31章的内容，其中有27章提到“为圣”“为士”之道。“为圣”之道，如甲组中：“圣人之在民前也，以身后之；其在民上也，以言下之”，“圣人亡为故亡败，亡执故亡失”，“道恒亡为也，侯王能守之，而万物将自化”，“圣人居亡为之事，行不言之教”，“民莫之命而自均安”；乙组中：“治人事天，莫若啬”，“清静为天下正”；丙组中：“太上下知有之，其次亲誉之，其次畏之，其次侮之”，“执大象，天下往，往而不害，安平太”，等等。“为士”之道，如甲组中：“以道佐人主者，不欲以兵强于天下”，“长古之善为士者，必微溺玄达，深不可志”，“和其光，同其尘，挫其锐，解其纷，是谓玄同”；乙组中：“上士闻道，勤能行于其中；中士闻道，若闻若亡；下士闻道，大笑之”，“修之身，其德乃贞；修之家，其德有余；修之乡，其德乃长；修之邦，其德乃丰；修之天下，[其德乃溥]”；丙组中：“君子居则贵左，用兵则贵右”，等等。

<sup>①</sup>罗运环：《论郭店一号楚墓所出漆耳杯文及墓主和竹简的年代》，《考古》2000年第1期。

“为圣”之道，实质上就是“君人南面之术”，是建议周王像古圣人那样无为而治。“为士”之道，是讲如何在险恶的政治环境中，一方面能“以道佐人主”，担当起作为“士”应该担当的责任，另一方面又能做到微妙玄达，和光同尘，保全身家性命。“为圣”与“为士”，是就不同的对象而言的，同时二者又有密切的联系。

《老子》中的“善为士者”：“豫乎若冬涉川，犹乎其若畏四邻，严乎其若客，涣乎其若释，屯乎其若朴，沌乎其若浊。”（甲组）这是一种若“愚”之大智。这种“愚人”，在二雅中称为“哲人”。《大雅·抑》：“人亦有言：靡哲不愚。庶人之愚，亦职维疾。哲人之愚，亦维斯戾。”“愚”分“庶人之愚”和“哲人之愚”，前者是自身缺陷所致，后者则是装傻以自保。二雅的作者们也像老子那样，一方面不满现实，积极为周王献计献策，另一方面又主张在昏上乱相之间保全自己。“黾勉从事，不敢告劳。无罪无辜，谗口嚣嚣”（《小雅·十月之交》），竭力勤劳王事之人反无辜遭谗，整日不得不“战战兢兢，如临深渊，如履薄冰”（《小雅·小旻》）。这就是“靡哲不愚”的原因。《吕氏春秋》《礼记》《大戴礼记》《史记》等典籍，都记载孔子向老聃问礼一事。老聃语孔子曰：“且君子得其时则驾，不得其时则蓬累而行。吾闻之，良贾深藏若虚，君子盛德，容貌若愚。君子之娇气与多欲，态色与淫志，是皆无益于子身。”（《史记·老庄申韩列传》）“容貌若愚”正是“善为士者”的特点，是“哲人之愚”。受此影响，孔子对这种“哲人之愚”也持肯定态度<sup>①</sup>，他赞宁武子说：“邦有道，则知；邦无道，则愚。其知可及也，其愚不可及也。”（《论语·公冶长》）老子、孔子与二雅的作者们对“愚”的态度是一致的。

## 二

竹简《老子》甲组的首章：“绝智弃辩，民利百倍；绝巧弃利，盗贼

<sup>①</sup>张勇：《孔子说“愚”》，《东方论坛》2004年第4期。

亡有；绝伪弃诈，民复孝慈。”此章在帛书、河上公、傅奕、王弼诸本中，均为“绝圣弃智，民利百倍；绝仁弃义，民复孝慈；绝巧弃利，盗贼无有。”两者的区别在于，竹简的“绝智弃辩”被改成了“绝圣弃智”，“绝伪弃诈”被改成了“绝仁弃义”，竹简反对“辩”“伪”，而今本反对“仁”“义”。竹简不反对“仁”“义”，这是它与今本最大的区别之一，表明儒道两家思想在春秋时期并没有形成对立，关于这一问题，学界多有论述，这里不再赘述。竹简《老子》为什么要反对“辩”呢？二雅给我们提供了答案。

西周末年，君主无道，朝政日非，连年大战，民心惶惶。春秋以降，“弑君三十六，亡国五十二，诸侯奔走不得保其社稷者不可胜数。”（《史记·太史公自序》）朝中权臣结党营私，造谣惑众。《小雅·正月》：“谓山盖卑，为冈为陵。民之讹言，宁莫之惩。召彼故老，讯之占梦。具曰予圣，谁知乌之雌雄。”他们能把高的说成低的，低的说成高的，都说自己是圣人，令人扑朔迷离，是非难辨。《小雅·小旻》：“懿懿訾訾，亦孔之哀”，“发言盈庭，谁敢执其咎”，发表意见的人充满朝廷，但都是相互诋毁，相互推脱，没有一个敢承担责任的。那些正直之人却动辄得咎，噤若寒蝉。《大雅·桑柔》：“维此圣人，瞻言百里。维彼愚人，覆狂以喜。匪言不能，胡斯畏忌！”哲人高瞻远瞩，不是不能言，而是不敢言。“念我独兮，忧心京京”，“念我独兮，忧心惄惄”（《小雅·正月》），他们只能茕茕孑立，形影相吊。

“能言者”与“不能言者”的处境大相径庭。《小雅·雨无正》：“哀哉不能言，匪舌是出，维躬是瘁。哿矣能言，巧言如流，俾躬处休。”“不能言者”常处困窘、忧愁的境地，而“能言者”则常处福禄之中。“能言”与“伪”是紧紧联系在一起的。《小雅·十月之交》中，当权贵族皇父为了给自己的封地建造都邑，在不同“我”商量的情况下就责令“我”搬家，强行拆毁“我”的房屋，并假惺惺地说：“曰予不戕，礼则然矣。”二雅的作者们对这种“能言”之人深恶痛绝：“蛇蛇硕言，出自口矣；巧言如簧，颜之厚矣。”（《小雅·巧言》）这些巧舌如簧之人，脸皮何等之

厚！他们的甜言蜜语只能加剧国家的动乱。

二雅的作者们用诗歌的形式描绘了“辩”给国家和社会带来的混乱和灾难，老子也正是生活在这样一种社会之中，作为“守藏史”，他更清楚地了解这种“辩”的虚伪本质和严重危害，因而从哲学的高度明确提出“绝智弃辩”“绝伪弃诈”的主张。竹简《老子》中，还有几章明确反对“辩”：“智之者弗言，言之者弗智”（甲组），“犹乎其贵言”（丙组）等。今本第四十五章中的“大辩若讷”，不见于竹简相应的篇章之中，而“大成若缺”“大盈若冲”“大直若屈”“大巧若拙”都出现于竹简，这与老聃“弃辩”的思想是一致的。

老聃与二雅的大部分作者们都属于“士”阶层，他们在周王朝有固定的职业和地位。战国以降，“士”从过去那种封建关系中游离出来，由“有职之人”而演变为“无定主”的“游士”<sup>①</sup>。他们往来穿梭于各国之间，宣传自己的主张，于是形成了崇辩的风气，也形成了学派之间的对立。在这种社会和学术背景下，竹简《老子》中的“弃辩”“弃伪”自然而然地被“弃仁”“弃义”所代替了。

### 三

针对春秋时期的混乱局面，老子提出了自己的“为圣”“为士”之道，“无为而治”是其核心内容。二雅也直接表达了“无为而治”的思想，这是两者的又一契合之处。“无为而治”的思想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。

首先，反对繁重的徭役和苛刻的政令。大雅中的《民劳》《板》《荡》《桑柔》《瞻卬》；小雅中的《节南山》《正月》《十月之交》《雨无正》《小旻》《巧言》《巷伯》等，都反映了厉王、幽王时赋税苛重，民不聊生的现实。二雅的作者们不但反对繁重的徭役，而且反对繁多的法教政令。他们

<sup>①</sup>余英时：《士与中国文化》，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，第79页。

认识到繁多的政令只会导致人民做出更多的邪僻之事，因而提出“民之多辟，无自立辟”，“辞之辑矣，民之治矣”（《大雅·板》），呼吁统治者放松对人民的钳制，让其自然、自由地生活。同样，老子也反对繁重的徭役和繁多的政令，提出“天下多忌讳，而民弥畔。……法物滋彰，盗贼多有”（甲组），“治人事天，莫若啬”（乙组），等等。

其次，对待战争的中庸态度。二雅中的战争诗主要有：小雅中的《采薇》《出车》《六月》《采芑》，大雅中的《江汉》《常武》等。这些诗都没有对具体战斗场面的描写，而是一方面写连年战争给人民带来的苦难，另一方面又歌颂戍边将士的爱国精神，这是一种矛盾的心理。这种矛盾的心理使他们对战争持中庸的态度：在不得已的情况下才进行战争，而且要能做到适可而止。正如朱东润先生所言：“通《诗》三百五篇读之，未尝有以战争为乐者。……《六月》之诗言：‘玁狁匪茹，整居焦获。侵镐及方，至于泾阳。’《采芑》之诗言：‘蠢尔蛮荆，大邦为仇。’皆足以见其时中国所受之压迫，不可以一日处，及其逼不得已，整军抵抗，然薄伐玁狁，仅仅至于大原，即行退回，而诗人已经有‘我行永久’之叹。……《采薇》《出车》两诗，周室全盛之时出兵之诗也，然诗人之怨，已充满于行间。”<sup>①</sup>二雅的作者们认为，战争的胜利不能靠兵威，而只能靠王道、盛德，他们所希望的是敌人自服、不战而屈。

同二雅的作者们一样，老子也对战争持中庸的态度。他一方面反对战争，他说：“以道佐人主，不欲以兵强于天下”（甲组），认为赞美战争就是“乐杀人”，而“乐杀人”者是不可得志于天下的。另一方面，又承认在不得已的情况下用兵的必要性，并提出作战经验“以奇用兵”等。这种矛盾的解决办法也是适可而止，即使战胜了也要“以丧礼居之”，要能做到“功遂身退”。

第三，顺性化民的政治主张。针对繁重的徭役、兵役，苛刻的政令给社会和人民带来的灾难，二雅的作者们和老子都提出了“顺性化民”的主

<sup>①</sup>朱东润：《诗三百篇探故》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版，第114—115页。